

读“通鉴”话读书

《资治通鉴》素来以叙治乱、明兴衰、资治道为核心，却在字里行间藏着诸多耐人寻味的读书故事。这些故事道破了读书的真谛：读书不在多寡，不在忙闲，而在存心致知、学以致用，唯有善读者，方能以书增智、以史鉴行、立身成事。

千年史册里，那些成大事者，无一不是把读书刻进骨子里的人，哪怕身居高位、军务缠身，也从未放下书卷。最家喻户晓的，当数孙权劝吕蒙读书的典故。说的是建安年间，官渡之战硝烟未散，18岁的孙权执掌江东，此后内靠旧臣周瑜、程普稳固根基，外拔新秀吕蒙、陆逊镇守疆土，深知人才与学识是政权存续的根基。他见吕蒙身居要职却以军务繁忙为由推脱读书，便直言劝诫：“卿今当涂掌事，不可不学”。面对吕蒙的推诿，他更是点破关键：“卿言多务，孰若孤？孤常读书，自以为大有所益。”孙权并非要求吕蒙钻研经学、成为鸿儒，只是让他涉猎史籍、通晓往事、汲取教训。

吕蒙劝听后潜心苦读，褪去武将的粗鄙，多了谋士的沉稳，以至于代儒将鲁肃途经寻阳，与之论事时惊叹“卿今者才略，非复吴下阿蒙”，更留下“士别三日，即更刮目相待”的美谈。正是这份读书沉淀的智慧，让吕蒙从一个武夫蜕变为东吴顶梁柱，顺利接替鲁肃执掌兵权。

无独有偶，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15岁登基，在战火中摸爬滚打拓展疆土，成为首个在中原立足百年的少数民族政权领袖。他虽起于草莽，却深谙智谋胜于蛮力，一日问博士李先：“天下何物最善，可以益人神智？”李先直言“莫若书籍”，拓跋珪当即下令，在郡县之内大肆搜集典籍，悉数运往都城平城。拓跋珪对知识的敬畏，让北魏快速融入中原文明，奠定百年基业。这恰恰印证，读书从来不分出身、不分族群，实践能让人知得失，而书籍能让人拓眼界、长智慧。

然而，《资治通鉴》也用惨痛的教训警示世人：读书而不化，不如不读；死读书而不践行，终是纸上谈兵，甚至祸国殃民。战国赵括便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，他自幼熟读兵法，谈起兵事连父亲名将赵奢都难不倒他，自以为天下无敌。可他只知死啃兵书，不懂随机应变，蔺相如直言他“徒能读其父书传，不知合变”，奈何赵王执意任用。长平一战，赵括死守兵法教条，盲目出击，最终导致赵军大败，40万赵国降卒被坑杀，赵国自此一蹶不振，“纸上谈兵”也成了千古笑柄。

南朝梁元帝萧绎，更是因误读而误国到了极致。他饱读诗书、学识渊博，却刚愎自用、不善理政，大敌当前、兵临城下，竟还在朝堂之上给群臣讲授《老子》，置军情于不顾。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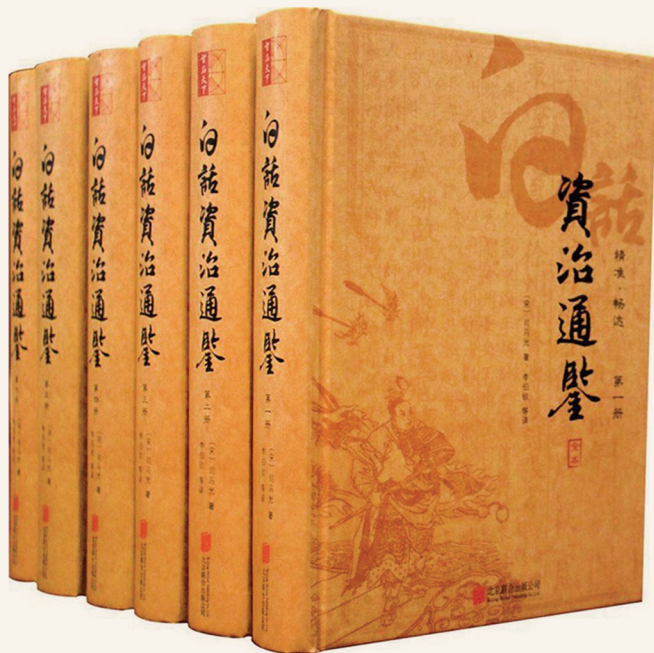
破亡之际，他非但不反思自己的昏庸无能，反而将罪责推给书籍，下令焚毁万卷藏书，面对魏军质问，竟称“读书万卷，犹有今日，故焚之”。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为《资治通鉴》作注时，直言驳斥此类论调：“帝之亡国，固不由读书也。”败亡从不是读书之过，而是读死书、死读书，只学皮毛、不践于行，把书籍当成了装点门面的工具。

纵观《资治通鉴》里的这些读书故事，高下立判、善恶分明。吕蒙、拓跋珪等人善读书，把书卷中的道理化作处事的智慧、治国的方略，以读书增智、以自省修身。赵括、萧绎

等人不善读书，把知识变成了自负的资本、逃避的借口，最终身败名裂、国破家亡。这世间从来没有无用的书，只有无用的读书之人。

真正的读书，从来不是忙里偷闲的消遣，也不是附庸风雅的作秀，而是沉下心来观往事、明事理、省自身、践于行。无论是身居高位者，还是平凡处世者，皆可从这些千年典故中悟得真谛：爱读书是态度，读好书是选择，善读书是能力，唯有三者兼具，方能以书卷为梯，登高望远、行稳不惑，这便是《资治通鉴》留给后人最珍贵的读书智慧。

(张国刚)



阅读者说

钱钟书《宋诗选注》中的黄庭坚人格

当我们谈论黄庭坚时，总绕不开钱钟书先生那本著名的《宋诗选注》——这部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的宋诗选本，以选诗精严、注释精妙、兼具学术深度与文学性著称。它跳出传统选本“求全求广”的思路，更注重挖掘诗歌背后的诗人心性与时代精神，是借选诗传递文学审美与人格解读的典范。
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：在这本选集中，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的苏轼有18首诗入选，而黄庭坚仅入选3首。但钱先生选中的三首诗，仿佛是三扇精心打开的窗户，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立体而真实的黄庭坚。

第一扇窗是《病起荆江亭即事》。这是一首关于友谊的诗。诗中，黄庭坚一边挂念活着的朋友陈师道（字无己），一边担心这位家境贫寒、常靠

借贷度日的苦吟诗人“闭门觅句”时断炊受冻；一边哀悼已逝的知己秦观，一边想起他“对客挥毫”的潇洒才情，不禁在西风中洒下泪来。这种在同一首诗里并存存好友的写法，暗合对杜甫“以诗记友”传统的呼应。通过这首诗，我们看到了黄庭坚的深情与忠厚。他不只是一位在书斋里琢磨字句的诗人，更是一位心系友人、有情有义的挚友。

第二扇窗是《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》。写下这首诗时，黄庭坚刚刚从戎州（今四川宜宾）贬谪地遇赦东归——此前他曾被贬黔州（今重庆彭水）三年，九死一生，重返中原。“投荒万死鬓毛斑”，短短七个字，道尽了那些年的艰险与辛酸。然而，他没有沉溺于诉苦，而是笔锋一转，写道“未

到江南先一笑”。这“一笑”，是劫后余生的庆幸，更是面对磨难的豁达。钱钟书先生敏锐地指出，同样写贬谪后的岳阳楼，别的诗人笔调凄楚，黄庭坚却透着一股欣幸与洒脱。从这里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坚韧而乐观的灵魂，他能在命运的暴风雨后，依然挺直腰杆，笑看青山。

第三扇窗是《新喻道中寄元明》。这是写给黄庭坚兄长黄大临（字元明）的家书。诗里没有高深的典故，只有朴素的牵挂：“但知家里俱无恙，不用书来细作行。”只要知道家里人都平安，就不用写长信来细细说明了。最动人的是最后两句：“一百八盘携手上，至今犹梦绕羊肠。”他当年和兄长携手走过蜀道中著名的“一百八盘”险弯（共108处

陡峭弯道）的情景，至今仍在梦中萦绕。这“携手上”三个字，写尽了兄弟在人生低谷时相依为命的深厚情谊。在这里，我们看不到文坛宗师，只看到一个珍视亲情、懂得感恩的弟弟。

钱钟书先生“惜墨如金”，只选了这三首，或许正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黄庭坚人格最动人的几个侧面：面对逆境的豁达，对待朋友的忠义，以及回归家庭的深情。他没有选择那些最能体现黄庭坚“点铁成金”诗学理论的“代表作”，反而选了这些情感自然流露的篇章，这或许在告诉我们，褪去“江西诗派开山”那层略显生硬晦涩的外壳，内里的黄庭坚，其实是一个温暖、真挚且无比坚强的人。

(行思)

漫言小语

孔子择友的标准是什么？

无论是在诗词还是在史传经典中，关于交友，古人早有许多论述，而对朋友的选择，也有许多戒示之言，比如庄子说“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饴；君子淡以亲，小人甘以绝。”君子的交情淡薄得像水一样，小人的交情甘美得像甜酒一样；君子淡薄却亲切，小人甜蜜却易断绝。《淮南子》说“行合趋同，千里相从；行不合，趋不同，对门不通。”品行志趣相投合，相距千里也能亲密不离；品行志趣不相同，门对门也不能沟通。无一不在说交友须谨慎、交友要志同道合。

关于交友，其实孔子早就提出过一个标准，就是三益三损。

孔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（《论语季氏》）

有益的朋友三种，有害的朋友三种。同正直的人交友，同信实的人交友，同见闻广博的人交友，便有益了。同谄媚奉承的人交友，同当面恭维背面毁谤的人交友，同夸夸其谈的人交友，便有害了。

这一句话，其实有着三层含义：第一，朋友有益损之分。第二，哪些是益友、哪些是损友。第三，结益友而远损友，这是字面没说而可从言语中看到的。

孔子曾说“无友不如己者”，意思是不和自己志趣不一样的人交朋友。而除了志同道合之外，朋友的性格也至关重要。

直，是正直不阿；谅，是诚实无欺；多闻，是博学多闻。友直，就会明言过错，“忠告而善道之”；友谅，就会坦诚相待，“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”；友多闻，就会明仁道、明事理，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

可见这三者，均不离仁道，且有助于仁，正如朱熹所言，“取善以辅仁，则德日进”，朋友之善，可以辅仁进德，相互切磋、“切切偲偲”。与这类朋友交往，就可以互帮互助、在仁的道路上共进了。